

生命的风帆

——记新华社秘鲁专家奥斯瓦尔罗·雷依诺斯

张 雯

—on Xinhua News Agency's Peruvian expert Oswaldo - Reynoso

He has been working in China for about ten years and is a famous expert of Spanish language in the translation circle. In the past ten yeats Chian has left him an indelible impression. However he has to leave his beloved China because he is suffering from cancer. Xinhua News Agency speaks highly of him and Chinese people will never forget him.

他在中国工作近10年，是翻译界著名的西班牙文专家。10年来，中国，给他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然而，他不得不离开他热爱的中国，因为他患了癌症。新华社给了他高度评价，中国人民也忘不了他。

(一)

你叫奥斯瓦尔多？！刚听说你这名字的时候脑子里反应出的是《叶塞尼亚》中那个英俊的中尉。我对拉美国家知道得太少了，请你多包涵。

通过和你，你的好朋友胡安夫妇，你在新华社的同事们的谈话，使我看到了你，一个秘鲁人，在中国10年生活的轨迹。这10年，你说它“至关重要”。可不是，一个人一辈子有多少10年？而50—60岁对你这样的作家来说，是黄金的岁月。你说过，要不是可恶的癌症，你还会呆得更长。还没启程回国，你就讲，你会怀念中国和这里的一切。那架凌空而去的银灰色飞机载你回到你的故乡，也满载着朋友们沉甸甸的祝福和希望，祝你，恢复健康。

第一次见到你时，正是你度过“惊涛骇浪”归于平静的时候，你已经做出决定——回秘鲁

去。88年底的突然发病，几乎耗尽了你的热情和精力，在同病魔拚搏之中，你不得不遵从医嘱对生活重做安排，你要回去，生活在家人之中。那时的你疲乏、冷静。即使这样，走进你那间有点纷乱的小客厅，握住你友好地伸出的双手，我还是感受到一股特殊的扑面而来的诗人气质，谈话越深入，对你的了解越多，这种感觉就越强烈。那松快地梳向脑后的满头白发；那黑黑的睿智的眼睛，虽然大病初愈，讲话的语调非常平缓，但从你讲话时嘴唇一开一合的特殊姿态，从你丰富的面部表情中，我能够避开语言障碍，感受到你的聪慧、敏感和热情。

你在临行前的自传里说自己是个：大学教授，讲故事者。你太自谦了，胡安先生曾经告诉我，你是开创秘鲁城市文学的作家之一，许多评论家把你作品的语言特色认为是秘鲁文学运用大众化语言的开端。现在的中学、大学课本和一些严肃的文学选本都选用了你的作品。可你还是愿意称自己是讲故事者，把自己比做那个中国电视中每晚出现的说评书的艺人，因为你喜欢顺其自然的事，从不强迫自己

写作，只是愿意把内心的声音，那些你有兴趣、有激情的东西说出来，讲给朋友们听，或是写下来，而是否出版，你倒无所谓。

(二)

你对中国形成最早的概念是在小学。老师发下的课本中有一则关于中国的故事，配有一张精美的插图。那时你是个爱幻想的孩子，捧着书，生出无数遐想。如今，你早已记不清故事的内容，但这已不再重要。你的中学老师，一位波希米亚诗人为你那梦幻般的遐想添注了不少纷繁的色彩。在课堂上，他有时会放下枯燥的课本，给你们朗诵一些美妙的诗篇，仿佛在让你们品尝精美的食品。他给你们讲中国的古诗，讲到兴奋之处忽然停下激动地喊着：“遥远的中国，李白和杜甫的家！”一双沉醉的眼睛看着你们。他还告诉你们，李白是酒醉之后淹死的。在一条摇摇晃晃的小船上，李白对酒当歌，醉意朦胧地望见水中一轮明月，便去拥抱它……这富于诗意的说法深深地打动了你。中国在你心中如同梦一般美丽。多年以后，你朝拜杜甫草堂，泛舟竹林环绕、飘满浮萍的西湖，又一次，感到置身于这一美妙的意境之中。上大学时，你读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由此对毛泽东著作中的哲学观点倍感折服，尤其是矛盾论，看待事物要一分为二的论断，令你茅塞顿开。多年后，当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向你发出邀请，中国最大的通讯社——新华社聘你为对外部西班牙文组专家的时候，你立刻一口答应了。

你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中国。你那时可曾想到，从此，自己便和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永远联系在一起。

(三)

你不会汉语，几乎一点儿不懂。你说过自己在学外语上没有灵气。读者看到这里会和我初时一样心存不解：你的工作只能是将译好的稿子加工润色，这能有多重要？因为不便向你提这个问题，我一直将它留在心里，慢慢琢

磨。第一次去你家采访，你举起我们名片仔细看看说：“啊！我也是个搞新闻的呢！”我先是一愣，随后想到你在新华社一干10年，已把自己看成是其中一员了。

直至我去新华社采访了你的同事们，才了解到对社里来说你的价值。

新华社那座漂亮的大厦已经落成，相比之下，你曾经在里面办公多年的老楼显得很旧。走在楼道里，就能感到那种老机关大单位有条不紊的持重作风。进了办公室，我一眼看到一张摆有一台打字机的办公桌，心想，也许那就是你以前工作的桌子吧？你们的办公条件不太好，7、8个人共有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你是不是也和大家一起盼过早点搬进新楼呢？

你的同事们告诉我，新华社聘请的外国专家差不多都是做改稿工作。人们评价说你是其中水平最高的一个。你是作家，在文字功力上得天独厚，一般的新闻稿根本难不住你。新华社向外发送的西班牙文的国内新闻最终都汇集在你的案头，经你润色、修改。所以最后它们在文字上体现的是你的风格，你的水平。简言之，你将同事们译成的西班牙文稿修改得符合现代西班牙文的习惯，也符合“信、达、雅”的要求。同事译成的稿件经过你的“点化”成为一条条生动的消息。

你把一些中国特有的语汇如：“责任制”、“五讲四美三热爱”意译成贴切的专用词。办公室靠墙处排放着一个个小抽屉组成的卡片箱，里面分门别类存放着各种常用词汇。组里同志讲，那都是由你审定好的。平日里，你就是大家的“活宝箱”。当一个中文词对应有几个西班牙文的词汇时，或是直译某个词汇使句子的感情色彩发生变化时，你就请中国同事细述中文词汇的含义，精心考虑之后选择西班牙文中意思最接近的词。例如，有一次原稿中使用了“因循守旧”这个词，中国同事按原意直译了，可你知道，那个西班牙文词有“保守、反动”的意思，你又询问中文原意，得知它是“墨守成

规习惯于老办法”等意思，于是改成一个感情色彩稍淡的词。对你来说，这也许并不难，但同事们无不对你的词汇量及你在语言方面的感受力感到佩服。作家的广泛兴趣使你对农、工、商各行都有所了解。但偶而也会遇到科技方面的生词、新词，你便认真地查字典，或是向懂行的中国同事请教，并不摆“专家”架子。你给别人改稿子，一旦有了改动，都是找到原译者，告诉他原来的译法为什么不好，用什么最合适。这样做的结果是，帮助组里的同事提高了文字水平。此外，你还给大家讲课，那些没有条件出国进修的同事在你上的课里学到不少东西。你走以后，大家回想起来，感到由于你在这10年，组里同志们的西班牙文水平都有一个飞跃的进步，整个对外部西班牙文组的水平已经今非昔比。

你对新闻文体很熟悉，有一种简练，准确的文风。有时候，大家一起讨论写作上的问题，对你的一手“漂亮活”都很羡慕。1982年起，新华社对外发稿进行改革，搞一种称作“新闻落地”的实验。新华社原来的对外发稿都是由总社向世界各地发电讯，当地记者站接收、打印、编成小册子向报刊分发，被使用的不多。“新闻落地”则不然，新华社直接与各国新闻机构签订合同，中方提供新闻直接发到各家报社、电台。各国新闻单位可直接收到新华社稿件。这对改变我国新闻时效性差的状况是一个突破。同时给新华社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社里经过研究考虑，决定西文新闻做“新闻落地”的试点。这是新华社有史以来的一件大事，是同世界各大通讯社进行的公开竞争。这可忙坏了你们，组里除发当日新闻之外还事先准备了200多条介绍中国的专稿，为保证质量每一条都经你精心改过，发出去之后，“命中率”之高，使得3个月的合同试用期过后，所有试用户都成了固定订户，你们的试验成功了！很快，新华社的西班牙文稿在时效和质量上超过了苏联的塔斯社。有一次，墨西哥《国

民报》总编来函说，新华社的西班牙文稿子文字上超过美联社。大家都明白那主要是靠了你的文字功底。

见到你的同事，谈起你时，总会听到对方一声轻轻的叹息：“太可惜了。”他们说，请到你这样的外国专家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你不仅水平高，工作态度也非常好，和组里同事们同甘共苦，融为一体。有时工作多起来，上班时间干不完，别的同志就去买来面包、点心放在你的桌上，大家一起加班。如果临时有了任务，便随时往宾馆给你打个电话，你则招之即来。每天，大家每个人的任务是两条、三条新闻，而你的看稿任务就是十几个人的总和。新华社常年有向外邮寄特稿的任务，尤其是每逢“十一”，要对外发送介绍中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成果的稿件。这种特稿内容广泛，要求文字上比较精彩，所以每次都送来借助你的“生花之笔”。10年来，光是这种特稿你就改了许多许多。你在中国的西班牙文翻译界是位权威人士，10年间几乎所有重大会议报道、重要文件的西班牙文译文都由你定稿。外文局和中央编译局也常找你“借”去给重要著作的翻译把关。这期间出版的《周恩来文选》、《朱德文选》、《邓小平文选》等著作的西文版几乎全都是请你修改、审定的。你最喜欢的艾青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也是由你翻译发表在秘鲁的报刊上。

(四)

那件不幸的事发生在1988年底。那天凌晨，你忽然发现自己便血，随后就晕倒了。同住在一幢公寓的胡安夫妇把你送到宾馆的诊所。谁也没有想到你会一下子病倒，而且是这样的病症——胃癌。

疾病夺走了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乐趣和寄托——工作，它也迫使你改变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从前的生活自此嘎然而止。你一直单身，在秘鲁这样的人并不特别，它能让你全身心地投入热爱和事业。但现在你得遵从医嘱，

回去和妹夫、外甥女住在一起，因为你需要家庭的温暖。看得出，你对这个变化无可奈何。

在中国，你本来过得是很愉快的。同事们有时戏称你“胖子”。你的确有“胖子”的特点、热情、随和，乐观好客。但你胖得一点不蠢，高高大大的身材显得人挺精神。你特别喜欢和大家一起搞活动，郊游、聚餐，都是热心的参加者。你还另有一个爱好——美食。和大多数单身专家不同，你不怎么在餐厅吃饭，总是自己动手做。你能烧得一手好菜。北京有名的餐馆你都去品尝过，论起最中意者，当是川菜。你说它“辣，和秘鲁菜有点象，味道棒极了！”你更喜欢喝酒，据说酒助诗兴，你始终记得李白醉酒作诗的故事。每每写作之时，端起一杯威士忌，呷上一口，文思便源源不断涌来……不知你这饮食偏好与你的病有无直接联系，但现在你不能喝酒却是肯定的。这使你觉得遗憾得很，在欢送你的晚会上，斟酌再三后才举起了一杯啤酒。

有些事初看上去有点奇怪，但似乎可以说明你的性格更适合与中国人相处。也许拉美人的热情、奔放碰上谦和、含蓄的东方性情可以相得益彰，而彼此都是火一样的脾气则难免针尖对麦芒。在新华社你从未跟同事有过争执和不愉快的事，周围的人都喜欢你的热情、聪慧。而在友谊宾馆你的那些拉美朋友中，很多人都记得和你激烈争吵过。你耿直执拗的性子使你容不了任何你看不惯的事，而且总是不加掩饰地表示出来。据胡安夫妇介绍，你有时会象天真的孩子那样冲动、固执。如果你认定一个人不错，便连同他的缺点也一并接受，而一旦你讨厌一个人时，便不顾情面不再理睬人家，虽然这种状态常常是暂时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一点点误会你生胡安的气，见面连招呼也不打，一直持续到你回秘鲁度假。后来，胡安也回国休假，跑去你家看望，一见面俩人谈笑风生，好象你们之间什么也不曾发生。

朋友们了解你，不肯在你面前谈论你敏感

的话题。一次，你和胡安夫人争论文章是否应当拿去出版。她认为，写了作品就应当拿给广大读者欣赏，也听取评论家的意见。可你生平最最反感的就是文学评论家。你说，你写东西只是因为自己有这个愿望，全凭自然感受，有时心里想到，嘴里讲出来已经心满意足，绝不是为了让批评家们去评头论足。从此，在你面前大家尽量不谈文学批评之类问题。

长期的独身生活使你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爱好。平时，你一下班就把自己关在公寓；甚至敲门都不开。“除非是叫我去品尝美餐”，——你这么说。而到了周末聚会，你又变成最活跃、最健谈的一分子，有时甚至要别人提醒你，别说得太多，给朋友们留点时间。你还是宾馆朋友们的“消息源”，因为在新华社往往能得到最快、最新的消息。每当有重要新闻的时候，朋友们中午会依次接到你的电话，听你那激动，疾速的语调传播最新消息。

晕倒在家里那天，你没有想到是胃出了毛病，因为平时没有什么症状。一瞬间你以为自己是心肌梗塞，你的家族中有许多人都是这样病逝的，其中有你的母亲和你最心爱的妹妹。但胡安夫人懂一点医学，她告诉你，心肌梗塞不会有便血的症状。首都医院查出你得的是胃癌并建议尽快实施手术。开始没有告诉你实情。因为癌症，这个现代医学尚未攻破的顽症，对许多人来说心理上会不堪重负的。胃癌患者在手术后如果能够一年不反复，那么生命也许可以延长3-5年，若3-5年内再不出现反复，则有可能继续延长。这在任何一个对生命抱有热烈追求和希望的人来说，都将是一个残酷的打击。你的手术比较成功，术后恢复状况很好。缘于对中国医生绝对信任的态度，你积极配合治疗，戒掉喝酒习惯，保持良好情绪。于是医生们和你的同事们决定告诉你实情，但拒绝告知你有关生命年限的问题。然而你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从大夫的眼神和讲话的声音里就能得到想要知道的答案。你依旧天天

散步锻炼，和朋友谈天说地，但你不能再保持平静愉快的心情。好象是不经意地，你用玩笑的口吻对朋友们讲，你的骨灰将来要分做两半，一半撒在秘鲁的密斯迪火山，另一半撒进中国的长江。在欢送会上，你说：“我将不得不离开中国，回到故乡，并永远留在那里……。”大家知道你心里明白，相对却默默无语，或只好装作若无其事。这半年多的时间大家和你一直处于这种欲诉无声、欲哭无泪的情境之中，心碎、心痛，却必须强忍。而你脸色愈加苍白，沉默的时候增多，却还尽量表现得和以前一样。

只有最亲近的朋友知道，你常常在夜深人静时难以入眠，神智清醒地躺到天明。这种情况你以前只有过一次，那就是20年前母亲去世的时候。

组里同事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始终守护在你身边。十几个人轮流去医院对你进行24小时守护。护士们听不懂你的话，同事们有时就干脆自己动手照顾你：端茶送水、洗脚、倒尿……医院里的大夫见了都很感动，大家其实是在代替你的亲人做这些。

平时朝夕相处，配合默契的集体一旦少了你，一下子很不适应。开始时工作相当困难，一度还接到订户来电，询问稿件质量为何忽然下降了？你出院后，组里同志托人把重要稿子带到宾馆请你审阅，有时干脆派车去接你到社里来。1989年“十一”十几篇特稿都是这样修改定稿的。你碰到问题还专门找到原译者核实了情况。

离开中国对你来说是痛苦和无奈的。在中国10年，你曾扬起生命的风帆驶向美好的理想。你已经把自己同这个国家深深联结在一起。你曾一遍又一遍地说，本来想呆更长、更长的时间……

临行的前一个晚上，我去你的公寓进行最后一次采访。墙上的墨西哥草帽和孔雀羽毛等等装饰品都已摘下，凌乱的房间里堆放着打好

的行囊。你准备了长长的临别讲话，关于中国和发展。你说自己有幸亲眼目睹了中国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10年中巨大的变革。由于参加自1977年以来的重大文件的翻译工作，得以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和其他国家完全隔离。你认为，正如当初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的许多问题出在执行上，许多很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就走样。例如现在，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到底引进些什么东西，许多人不明确，或是嘴上明确，脑子里不清楚。大批高档消费品的进口，不仅会冲击国内市场，而且造成了不符合国情现状的高消费观念的风行，这对中国非常不利，也违背了对外开放的初衷。你希望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坚持下去，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艺术领域。

你讲起刚来中国的那些日子。一下飞机，坐在汽车里看到沿途尽是绿树、田野，高楼很少。有一次你去大栅栏闲逛，一条条胡同纵横交错，你走着走着就迷了路。问别人也没人所得懂你的话。这时，路旁一个乘凉的老头站了起来，居然用西班牙文问你要不要帮助，之后还热情地请你吃西瓜。你问他姓名，他笑笑不答，只说：“象这样的友谊不是很好吗？”此后，你从未再见过这个老头，虽然你一直认为北京会西班牙文的人不很多，早晚有一天应该碰到。后来，你终于有了许多中国朋友，但这位老者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你美好的记忆之中。

临别时，我为你在颐园公寓外拍了一些照片。现在我翻看着它们，想到这是你留在中国的最后的身影，也想到此刻也许你正在利马的家中思念着中国。电视上近来常有秘鲁的消息，利马正在戒严，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影响到中低收入工人、农民，也影响到了中产阶级。这样的环境对你养病会不会有影响呢？

希望很快得到你的消息，希望你能康复……